

湘潭大学湘学研究所主办

# 湘学

第六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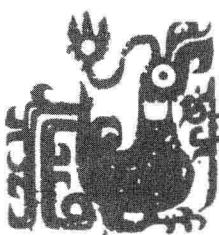
湘潭大学出版社

主编 陈代湘  
副主编 方红姣

湘潭大学哲学系35周年系庆特刊  
湖南省「十二五」哲学重点学科资助出版

# 湘学

第六辑



湘潭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湘学. 第 6 辑 / 陈代湘主编. — 湘潭: 湘潭大学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81128-762-2

I . ①湘 … II . ①陈 … III . ①学术思想—思想史—研究—湖南省 IV . ①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193777 号

责任编辑：王晓园

封面设计：闪电书装工作室

出版发行：湘潭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南省湘潭市 湘潭大学出版大楼

电话(传真): 0731-58298966 0731-58298960

邮 编: 411105

网 址: <http://press.xtu.edu.cn/>

印 刷: 国防科技大学印刷厂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405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28-762-2

定 价: 42.80 元

# 目 录

## 湘学通论

### 湘学研究什么

- 在北京座谈会上的发言 ..... 方克立(3)  
“湘学”概念的历史考察 ..... 方红姣(6)

## 湘学思想渊源研究

- 战国秦汉之际湖湘地区的文化学术状况 ..... 蒋 波(19)  
小人与君子语义流变阐微 ..... 徐建勇(27)

## 宋代湘学研究

- 周敦颐经济哲学思想管窥 ..... 徐孙铭(41)  
周敦颐君子人格理论浅析 ..... 黄守红(47)  
湖湘学派年谱长编之一 ..... 王立新(53)  
胡寅《读史管见》的三个文献学问题 ..... 刘依平(64)  
张栻在湖湘学派中的地位 ..... 陈代湘(70)  
庄子与朱熹:生态保护思想的比较分析 ..... 徐 刚 王晓艳(74)  
白首南迁 纵心顺命  
——范纯仁永州事迹考述 ..... 汤 军(79)

## 明清湘学研究

- 王船山思想与易学及佛老学之关系刍议 ..... 邓 辉(89)  
论王船山“贞生安死”的生死观 ..... 肖剑平(95)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王船山研究 ..... 朱迪光(102)  
明沈云英《湖归秋色图》考述 ..... 潘雁飞 王志芳(109)  
清泉细写心  
——胡海及其“写心岩”榜书石刻 ..... 张京华(116)

## 近代湘学研究

- 近代湖湘哲学的发展 ..... 王兴国(125)  
魏源《默觚·学篇》哲学思想探析 ..... 王向清 李浩森(142)  
曾国藩家教思想研究 ..... 林国标 肖 琴(149)  
19世纪末湖南维新思潮中“世界历史”观念的确立 ..... 易燕明 孙天培(159)

李石岑、柏格森思想研究 .....	李伏清	方 楠(165)
马非百史学成就述略 .....	刘志靖	廖常姣(173)
平民教育家周方 .....		周乐国(179)
外和诸戎,内须变法:郭嵩焘的洋务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	周接兵(185)	
骆鸿凯《楚辞义类疏证》考辨 .....	邓 盼(193)	

### 当代湘人论坛

两种主义,四种选择 .....	启 良(201)
-----------------	----------

### 湘学著作评述

#### 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奇葩

——读《湖湘学案》 .....	徐 刚(215)
-----------------	----------

#### 苦难世界的生命壮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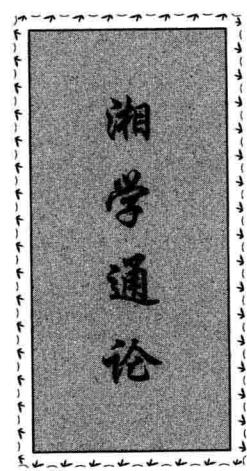
——读《天地大儒王船山》 .....	陈 晨(220)
--------------------	----------

#### 心系斯文,守望斯文

——读《守望斯文:叶德辉的生命历程和思想世界》.....	党时勇(223)
------------------------------	----------

### 湘学研究资料索引

2010 - 2014 年湘学研究资料索引 .....	党时勇 贺 全(229)
-----------------------------	--------------





## 湘学研究什么

### ——在北京座谈会上的发言

方克立

湖南省委省政府对湘学研究这么重视，专门成立省湘学研究院来推进这一事业，我作为一个湖南人，自然非常高兴。湘学研究刚起步时也很困难，但是后来受到省里重视，支持力度较大，发展速度很快，现在是一片大好形势。王伟光同志用力推了一把，对促成这件事情贡献也很大。

自从上个世纪 40 年代李肖聃写了《湘学略》一书后，差不多半个世纪，湘学基本上无人问津。1998 年我在参加湘潭大学 40 周年校庆活动时，讨论该校新建的中国哲学硕士点该怎样发展，我认为各个学校都应有自己的学科特色，考虑到湘大人文学科的整体力量还比较强，同时考虑到湘潭碧泉书院是湖湘学派最早的发源地，有一定的地缘优势，所以建议湘大中哲学科可以湘学研究作为重点和特色来发展。在具体做法上，我建议先编辑出版《湘学》辑刊，条件成熟了再成立湘学研究所，当时就得到潘长良校长和哲史学院领导的积极支持。湘大的同志真抓实干，1999 年就出版了《湘学》第一辑，2001 年成立湘学研究所，逐渐形成一个中青年学术团队。近十年来，他们编写出版了两卷本的《湘学史》（《湖湘文库》本），五本《湘学》辑刊，创办了《湘学研究》网，“湘学研究丛书”也在陆续出版中。这个时期，除了湘大之外，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省社科院的王兴国等学者也在湘学研究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引起省里领导的重视，加上王伟光同志以中国社科院领导的身份予以支持和推动，才出现了今天湘学研究的大好形势。湖南省湘学研究院成立的时间不长，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刚才刘云波同志介绍了，朱有志院长也介绍了，提出的初步规划切实可行，我都很赞成。

我觉得今天这个座谈会的题目很好：湘学研究院研究什么？首先要搞清楚，湘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内涵、外延是什么？明确了这个问题，研究工作才能开展，做工作才有抓手。对于这个问题，大家的看法可能并不完全一致。刚才朱院长讲有狭义的湘学，有广义的湘学，都需要界定清楚。湘学研究院研究什么？我讲三点看法：

一、严格的学理意义和作为一种地域学术传统的湘学，是指从两宋到清末，在湖南地区产生和发展的一种将儒家的性理哲学与经世之学相结合，主张体用合一、“内圣”与“外王”并重的学术形态，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千年湘学”、“传统湘学”。这应该是湘学研究的主体内容 and 核心内容。

北宋的周敦颐是宋明理学的开山，也是湘学肇始的一个象征性人物。南宋时期以胡

宏、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是当时影响很大的四大理学学派之一。明清之际湖南出了大思想家王船山，他是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总结性人物，也是从古代湘学过渡到近代湘学的关键人物。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几个重要关头，湘学人物都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并相应地出现了几个人才群体。其中包括鸦片战争前后以陶澍、魏源等人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人才群体，咸丰年间以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为代表的湘军儒将集团，19世纪末以谭嗣同、唐才常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派人才群体，20世纪初以黄兴、蔡锷、陈天华、杨毓麟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人才群体。他们大都出身于岳麓、城南等书院，深受湖湘学统的熏陶，也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了湘学的学理和学风。王伟光同志在湖南省湘学研究院成立大会上讲话的题目是《一本湘人奋斗篇，半部中国近代史》，这样讲有一定道理，湘学人物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确实是不可忽略的。

湘学是一个有特定内涵和时空范围的学术思想史概念。它是中国传统学术即“国学”的一部分，具体说是中国儒学、宋明理学的一部分，与濂、洛、关、闽、江西之学、浙江婺学等地域学术传统一样，都是属于宋明理学中的不同学派。从两宋到清末，湘学学者都认同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尊崇宋明理学，坚持儒家道统，这是决定其学说、学派性质的一个基本特点。另一方面，湘学又有自己的独特个性，就是反对空谈道德心性，主张“学贵力行”、经世致用，提倡实事实功之学，它是宋明理学中很有特色的一个学派。当然湘学还有其它一些特点，但最主要的是这两点，所以说它是将儒家的性理哲学与经世实学相结合的一种学术形态。千年湘学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蕴藏着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研究、挖掘得还很不够，在这方面今后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二、除了研究千年湘学之外，还要做历史文化溯源的工作，包括考察古代南方楚文化的影响，以及屈原、贾谊、柳宗元、刘禹锡等宋以前流寓湖南地区学者所做出的贡献，甚至可以追溯到楚祖鬻熊，追溯到舜文化和炎帝文化。叶德辉说：“湘学肇于鬻熊，成于三闾。”三闾大夫屈原是周敦颐以前古代湘学的另一个象征性人物，但是宋以前的湘学与宋以后的湘学情况非常不同，两个阶段有重要的差别。屈原等人可以纳入广义的湘学研究范畴，在某种意义上讲，宋以前并不存在宋以后那么一种有特定的学术内涵和学术传承特点的湘学，那时还没有形成所谓“湖湘学统”。宋代学术重心南移为湘学等地域性思想文化和学术传统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湘学的千年传承主要靠宋元明清时期在湖南地区非常发达的书院教育传统，一代一代书院学子，在他们的老师、包括山长的教育培养下，学习和传承的都是湘学的学理、学说与学风，即所谓“溯五峰（胡宏）之道脉，缅广汉（张栻）之流风”。这样代代相传，就形成了一种学术传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湖湘学统”。湖南的书院教育传统对湘学的千年传承和发展贡献非常大，宋以前不存在这么一个条件，思想文化溯源的工作就要困难一些，自然也粗略得多。

三、要研究千年湘学、传统湘学的现代影响和现代意义，包括研究湘学精神的现代转化问题。这就是座谈会邀请函所提出的：“湘学研究如何促进当代发展？传统湘学如何焕发青春？”我认为用“传统湘学”这个概念是科学的、严谨的。这种研究主要是总结千年湘学中的积极内容和精神价值，充分发挥它对今天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的促进作用。湘学研究必须为现实服务，为文化强省、文化强国作贡献，传统湘学可以提供许多有价值的精神资源。比如湘学中有一种注重探讨宇宙人生之大本大源问题的原道精神传统，湘学提倡知行统一、强调“学贵力行”和经世致用的实学学风也非常突出；另外，一些

湘学人物还表现出了不囿成见、兼容并包的开放气度和与时偕行、变革求新的通变精神；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不论是南宋时期的湖湘学派，还是明清之际的王船山，都表现出了坚持民族大义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这些宝贵的精神资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经过批判继承和创造性的转化，都可以为今天的现实服务，为今人提供思想启示和历史借鉴，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在湘学研究中，有一个问题我们过去曾经讨论过，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也提出来请大家考虑，就是要不要提“现代湘学”这个概念？有没有“现代湘学”？什么是“现代湘学”？传统湘学是一种前现代的理学型的学术文化，它能不能转化为某种现代学术形态？怎样转化？我个人认为回答这些问题要慎重，要根据事实说话。大家知道，毛泽东曾经深受湘学传统的影响，但是我们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成果之一的毛泽东思想归属于“湘学”的范畴，因为它不是对传统湘学的简单继承和延伸，而是对传统湘学的根本改造和超越，二者有性质上的根本不同。比如“实事求是”是湘学的一个重要传统，曾国藩将实事求是解释为朱熹讲的“即物穷理”，就是把它理学化，毛泽东则把它改造成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命题，使它获得了全新的意义和价值。能不能说毛泽东思想是“现代湘学”？我还没有听到有人明确这么讲，可见大家还是采取慎重态度。决不能把毛泽东思想归结为一种地域文化，就像不能说邓小平理论是“现代蜀学”、科学发展观是“现代徽学”一样。不但不能把毛泽东说成是“现代湘学”的代表人物，就是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湖湘学统影响的李达、金岳霖、李泽厚等现代湘籍学者，也不能把他们的学术思想归结为“现代湘学”，因为不论是马克思主义、新实在论还是所谓“人类学本体论”，都是一种现代性的思想学说，不能将其框限在某种传统地域学术文化的范畴内。在座的学者，不少是湖南人，能够说你们做的学问是“现代湘学”吗？大概不好这么说。今天中国的几大思潮，代表人物中间都有湖南人，他们之间的思想分歧和相互关系实际上是当代中国整个思想格局的反映。像濂、洛、关、闽、湘学、蜀学、浙学、徽学这样一些有特定时代内涵、表现出地域文化特征的传统学术概念，都不能随便延伸到现在，否则容易混淆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的界限。

刚才省湘学院的同志提出这样一个思路，就是打算利用湘学研究这个平台，适当扩大研究范围，把对湖南的历史文化、社会习俗、教育科技、名人名著、湖南人的精神特质等方面的研究都带动起来，为文化强省服务。我认为这个思路是可行的，它与湘学的概念界定还不是一回事。扩展研究范围也是有界限的，一是要在文化的范畴内，二是研究要有学术性，不能把与湖南有关的什么事情都和湘学挂在一起。“湘学”这个概念一定不能泛化，不能把它界定为研究古往今来的湘人湘事的学问。湖南人都是“湘人”，在湖南发生的事情都是“湘事”。我们不可能把古往今来、林林总总、大大小小的湘人湘事都作为湘学研究的对象，都纳入湘学研究的范围，那样就没法操作了。

我对湘学研究什么的三点看法，只是一家之言，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 “湘学”概念的历史考察

方红姣

作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历史传承性的学术思想派别，湘学在长期的发展中有过不同的称谓。方克立先生早在 2002 年的一篇文章《湘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和意义》<sup>①</sup> 中，就将以往在湖南地域学术思想文化研究中出现过的概念（如湖湘学、湖南学、湖南一派、湘学、潭学、湖湘文化等）作了三个层次的分类，即“湖湘学”、“湘学”和“湖湘文化”。“湖湘学”概念最早由朱熹提出，是南宋时期差不多与朱熹同时的一个很有影响的湖南地域思想学派，属于理学的一支。此学派至南宋末年逐渐衰落。“湖湘文化”则是一个涵摄面非常广的大文化概念。与这两个概念相比，“湘学”介于二者之间，不像湖湘学那么窄，又比湖湘文化更能体现学理性。因此，方先生说：“我认为选择湘学作为我们这个学科的研究对象比较合适。它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和比较深厚的历史传统，作为一门思想性、学理性较强的学科，研究对象明确，学术内容丰富。”<sup>②</sup>

“湘学”两字连用，明确作为一个有特定指称的概念起于何时？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们有一个看法，认为大体是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如方先生说：“我没有考证过这个概念是谁最先提出来的，从接触到的有限文献资料来看，它在上个世纪之交已被广泛使用。”<sup>③</sup>王立新说：“近世湘学称谓的重新流行大致时间是在上两个世纪交替之前（1897 年前后），确切时间不好确定。”<sup>④</sup>陈代湘说：“迄今所知，‘湘学’这一概念在 19 和 20 世纪之交已相当流行。”<sup>⑤</sup>我很赞同湘学概念出现于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这个时间段的看法，想在此基础上结合史料做一些具体深入的说明，并进而考察其后湘学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内涵的嬗变。

<sup>①</sup> 此文载于《湘学》第 2 辑，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此后其他主要相关文章有：《湘学称谓的历史变迁及其内涵》（王立新，《湘学》第 2 辑）；《湘学的内涵与范围》（陈代湘，《湘潭大学学报》，2007 年第 2 期）；《湘学的源流与学统》（朱汉明，《湖南大学学报》，2013 年第 1 期）；《湘学的传统形态和近代转型》（朱汉明，《中国学术史研究》）

<sup>②</sup> 方克立，《湘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和意义》，《湘学》第 2 辑，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 页。

<sup>③</sup> 方克立，《湘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和意义》，《湘学》第 2 辑，第 4 页。

<sup>④</sup> 王立新，《湘学称谓的历史变迁及其内涵》，《湘学》第 2 辑，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3 页。

<sup>⑤</sup> 陈代湘，《湘学的内涵与范围》，《湘潭大学学报》，2007 年第 2 期。

## —

湘学概念的最早使用，出现在《湘学报》以及当时著名报人和学者梁启超等人的文章、信函中。

1897年4月22日，湖南近代第一份新式报刊在长沙诞生，它直接以“湘学”二字冠名，名为《湘学新报》。该报主要设有六个固定栏目：史学、掌故（后改为时务）、舆地、算学、商学和交涉。每旬一册，自第二十一册起改名为《湘学报》。由学政江标发刊，后改由徐仁铸督办。报纸重视学理的研究，学术思想性较强。《湘学新报例言》中有言：“中国通商以来，风会渐开。香港、广东、福建、上海、汉口、天津等处次第开设报馆。大致言政者多，言学者少。言改政者多，言广学者少。”<sup>①</sup>《湘学新报》即为改变当时新兴报界普遍存在的弊端而创办的，这个弊端就是各种报纸无一例外地关注时政，而于学术思想、学理之倡明方面极其缺乏。因此，“本报专从讲求实学起见，不谈朝政，不议官常。盖学术为致治之本。学术明，斯人才出。”<sup>②</sup>在政治与学术之间，他们认为学术思想能洗涤心灵，开启民智，培养人才，是更为根本的。那么，《湘学报》所欲“言”、欲“广言”之“学”是什么呢？《湘学报》声张维新与变革，以提倡新学、讲求实学、开启民智为宗旨，积极介绍新知识、新学术。从其所设栏目来看，此学有西学、有中学。但是，至为核心的当是作为凝聚湖南人的民主革命斗志的湖南固有之学术思想和精神，故报纸冠名为“湘学”。

《湘学报》在湖南、湖北等地广受欢迎，在全国范围内亦有相当大的影响。谭嗣同对这种影响力有很高的评价。他在致徐仁铸的信中说：“诸新政中，又推《湘学报》之权力为最大。盖方今急务，在兴民权，欲兴民权，在开民智。《湘学报》实巨声宏，既足以智其民矣，而主论处之注射民权，尤觉难能而可贵。”<sup>③</sup>“自《湘学报》出版，读者咸仰湘才若在天上矣。”<sup>④</sup>

《湘学报》在全国范围的影响力，还可从当时学者的信函中得见一二。1898年，《时务报》总经理汪康年与主笔梁启超意见不合，报纸面临改官办的困局。汪康年很不满，正在犹豫之际，浙江学者陈汉第写信给汪，力邀其赴浙办学。信中两次提到湘学。“方今各省学会，舍湘学而外，无人创设。湘学已为康教所惑，浙学汲汲宜办，以杜其未萌，先发制人，此其时也。”<sup>⑤</sup>康即康有为，康梁是一派。在陈汉第看来，以康有为等为代表的湖南人在各省中率先创办学会，藉此宣言革命，弘扬湘学精神。虽然陈汉第是站在对立的立场，对康有为之说持批判态度，但可见湖南在当时众多省份中首创学会，办新报，倡扬湘学思想，影响巨大，是其他省份不可迄及的。陈汉第在这里提到“湘学”，时间在1898年6月19日，可能比梁启超在《说方志》和《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言及还要早。

由于报纸本身学理性强、周期慢，加上保守派人士反对，维新派人士创办了一份更为

<sup>①</sup> 《湘学报》，江标等编，《湘学新报例言》，第8页，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sup>②</sup> 《湘学报》，江标等编，《湘学新报例言》，第9页，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sup>③</sup> 蔡上司、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0页。

<sup>④</sup> 蔡上司、方行编，《谭嗣同全集》，第472页。

<sup>⑤</sup> 陈汉第，《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045页，6月19日来信。

通俗的日报《湘报》，维新舆论阵地逐渐由《湘学报》转移至《湘报》。《湘学报》于1898年3月停刊，共出四十五册。《湘报》为日报，语言形式上也做了改变，变得更为短小精悍、简单通俗。不过主旨是一贯的，其中之一即为发扬湘人固有之精神。《湘报序》中说：“丁酉戊戌间，谭复生、唐维丞诸君子发行一日报于长沙，名湘报。是为湖南有报纸之始。其报宗旨有二，一曰鼓吹民主政治，二曰发挥湖南人固有精神。”<sup>①</sup>梁启超说《湘报》为湖南有报纸之始，此语不太确切。严格地说，应该从《湘报》的前身《湘学报》算起。他指出倡扬民主和发挥湖南人固有精神是两大宗旨，则概括得很精当。对比《湘学报》和《湘报》，除基于相同的宗旨之外，正如前文提到的《湘学新报例言》中所说，《湘学报》（《湘学新报》）比《湘报》更侧重于“学”。《湘学报》比《湘报》多了一个“学”字，即表明前者强调的是学理性、学术性。在包括梁启超、陈汉第在内的许多湘外人士的观念意识和文字表达中，此“学”是区别于浙、粤等其它省份的，特指湖南地域之学。1897年前后，随着湖南在民主革命运动中的突出表现，以及《湘学报》、《湘报》的广泛社会影响，“湘学”在当时的学者、文人的观念里已是很被认可而又被普遍接受的观念了。

## 二

与陈汉第等学者们普遍的、相对随意的运用不同，梁启超是第一个从学术的角度梳理这一强调学理性、学术性的湖南地域“固有之学”的学者。

就在《湘学新报》创立几个月后，于1897年底受聘来湘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的梁启超，后来在《说方志》和《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中有两处明确提到“湘学”：

“邓湘皋（显鹤）为湘学复兴之导师，于湖南文献网罗最博。以独力私撰道光《宝庆府志》、道光《武冈州志》，最称精审”。<sup>②</sup>

“新化邓湘皋（显鹤）搜罗乡邦文献最勤，裒辑船山遗著于散佚之余，编校刻布，力事宏奖。……自是湘学彬彬矣。”<sup>③</sup>

首先来看时间。《饮冰室文集》是梁启超1902年自选的文集，以编年体印行，广智书局出版。而《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由梁启超侄子梁廷灿编纂，1925年编集，于1926年正式出版，是经过梁启超认可的，是他生前最后出版的文集。后来的《合集》是以《饮冰室文集》和《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为底本和主要参照本点校的，目录编次和文章编次都没有更改，只是取消了原来的卷次。因此，梁启超在这里提到的“湘学”，时间虽不能肯定是在1897年底或1898年，但可以确定至少是在1902年之前。再来看内容。梁启超这两段话中实质上都在表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邓显鹤。为什么在梁启超看来，邓显鹤是湘学复兴的“导师”，在湘学复兴中起了如此重要的作用呢？湘学概念兴起所依赖的最重要的“学”的资源是什么，这个资源与邓显鹤有什么关系呢？

邓显鹤（1777—1851），字子立，号湘皋，湖南新化人。是嘉庆、道光年间在整理湖

<sup>①</sup>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四十《湘报序》。

<sup>②</sup>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一《说方志》。

<sup>③</sup>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一《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

南文献方面卓然有成的学者，一生致力于方志的编纂与乡邦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其中最重要的是对《船山遗书》的搜刻。王船山有著述百余种，四百多卷。在世时均未刻印，散佚很多。船山逝世后，其子王敔整理刊刻了十几种六十多卷，但惧于文字狱，未能公开发行。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库开馆，船山著作中属于经籍训诂、名物考订的《周易》、《尚书》、《诗经》、《春秋》四种稗疏及《易经》、《诗经》两种考异被收录，共六种十六卷。《四库全书》属珍藏抄本，流传不广。船山著作首次较大规模的整理刊刻和公开传播始自邓显鹤。邓显鹤与王船山裔孙王世全将船山著述十八种，一百五十卷加以整理，于道光十九年（1839）在长沙开雕。咸丰四年（1854），因太平军攻陷湘潭，雕版毁于战火。邓显鹤曾多次寄书曾国藩兄弟，敦促刊印船山遗书。同治二年（1863），曾国藩、曾国荃在邓显鹤搜集整理的基础上“增益百七十二卷”，于同治四年（1865）年正式出版。因邓显鹤的搜集和首刊，湮没近二百年的船山思想逐渐为湘人、世人所知悉。梁启超表彰邓显鹤，一方面是看到了邓显鹤在湖南文献搜集整理、特别是船山遗书搜刻方面的独特贡献，另一方面亦凸显出了王船山在近代湘学复兴中的思想指引作用。王船山思想成为极为重要的湘学精神资源，直接培育了晚清湖南的两大人才群体：一为清末戊戌变法中以谭嗣同等为代表的维新变法人士，向后可延伸至黄兴、宋教仁等民主革命志士；一为更早时期的咸同年间以曾国藩为核心的湘军儒将集团。

戊戌维新运动前后，谭嗣同极力宣传船山思想，梁启超本人亦非常重视船山思想。对此他曾不止一次地谈到：“浏阳谭复生与其友同县唐继丞共学。复生少治龚魏之学，好今文经学，又好今文家言，又研究船山学，能为深沉之思。”<sup>①</sup> 又说：“我的朋友中，如戊戌死难的谭嗣同，即由常州派及佛派的结合，再加上一点王船山的思想，以自成其学问。”<sup>②</sup> 这两段文字的意思是一致的。在梁启超看来，谭嗣同思想的主要构成因素是尊今文经学的龚魏思想、船山思想和佛学。第二段文字中的常州派就是指重今文经学的邵阳人魏源和龚自珍。其实，在梁启超看来，龚、魏与船山同属“湖湘学”一脉。他说：

湖南自衡阳王船山以孤介拔俗之姿，沉博多闻之学，注经论史，评骘百家，著作等身，巍然为一代大师。虽然，壤地窎僻，与东南文物之区不相闻问。门下复无能负荷而光大之者。是以其学不传。自兹已往，百余年间，湖湘学者无述焉。逮嘉庆中，然后邵阳魏默深崛起。默深之学，方面极多，与龚定庵同为常州派今文经学之骁将，又善治史，著《圣武记》及《新元史》。又好谈时务，著《海国图志》，述域外地理及海防政策。晚乃治佛学，修净业。<sup>③</sup>

从以上梁启超对谭嗣同思想的评述中可以看出船山思想对谭嗣同的深刻影响。这一分析切合实际，也是对谭嗣同时期湖南变法人士思想的一个写照，极具代表性。

另外，我还想说明湘军对于近代湘学观念流行的重要意义。在“湘学”于1897年前后普遍流行之前，其实还有一段观念酝酿、积累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是伴随着湘军的崛起而逐渐加深和明晰的。

1853年，湘乡人曾国藩丁忧在籍。此时，清廷仅靠清军力量已不足以抵抗太平军的

<sup>①</sup>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四十一《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

<sup>②</sup> 梁启超，《儒家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5页。

<sup>③</sup>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四十一《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

势力，故而鼓励各省自办团练。曾国藩奉旨与湖南巡抚张亮基兴办湖南团练，先是创建了名为“湘勇”的军队，后扩建为更庞大、更完备的“湘军”。湘军在十几年应对太平军的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湘人在全国的影响随着曾国藩湘军的事功而逐渐扩大和加深，从而一改“道咸前，湘士殊少之名”<sup>①</sup> 的状况。曾国藩个人信奉理学，推崇王船山，他与一生至交刘蓉是少年时在岳麓书院求学的同学，湘军中的其他重要人物大都是湘中深受湘学熏陶的理学人士。在曾国藩的组织下，湖湘理学人士陆续乘时而出，集结在一起，“先之以友朋，继之以婚姻，俨然成一集团。及太平军逾岭而北，彼等皆际会风云，展其骥足，足为理学吐气”。<sup>②</sup> 这里所说的得以扬眉吐气的“理学”，乃是在湖南有着一贯传承的有明显地域特色的理学——即后来所说的“湘学”。自此，中国人才尽仰于湘，湘中之学在人们的观念中逐渐明晰，湘学成为团聚、鼓舞湘人团结一致的精神力量，也成为世人判定湖南人之为湖南人的符号。

在学理的层面，有船山思想的精神指引；在事功的层面，有湘军的社会政治影响力，因此，“湘学”一词在 19 世纪末得以流行是很自然的事。船山思想在湘学概念兴起中具有重要意义。就这一点而言，首刊《船山遗书》，弘扬船山思想的邓显鹤被称为近代湘学复兴的导师，乃实至名归。湘学概念兴起之时，甚至有将船山学直接等同于湘学的表达。比如杨毓麟在 1902 年写的《新湖南》一文中说：“且我湖南有特别独立之根性，无所表现，其影响仅仅及于学术而未大显。……其岸异之处，颇能自振于他省之外，自濂溪周氏，师心独往，以一人之意识，经纬成一学说，遂为两宋道学不祧之祖。胜国以来，船山王氏以其坚贞刻苦之身，进退宋儒，自立宗主。当时阳明学说遍天下，而湘学独奋然自异焉。”<sup>③</sup> 杨毓麟一方面从学理层面将湖南人特别独立之根性的渊源追溯至北宋中期的湖南理学家周敦颐，一方面又表彰王船山一反晚明阳明学之空疏，总结朱子，继承张载，不同流俗的独立精神。此处的“湘学”即是指“船山学”。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在晚些时候的 1925 年，又有两段话谈到湖南之学，不过他没有用“湘学”这个概念，而是称为“湖湘学派”。如说：

“南宋学派，主要是朱陆两家，历元明清三代，两派互为消长，直至现在仍然分立。两派之外，还有两个人需要注意。一个是张南轩，可以说他是朱学的附庸，死得很早，没有多大成就，与朱子并为一派无妨。南轩生在湖南，湖湘学派，与朱子学派，实在没有什么区别。”<sup>④</sup> 这一段是梁启超对南宋理学学派分梳之认识。他指出南宋理学除了朱子、陆王之外，还有一个张南轩值得注意，南轩所代表的就是湖湘学派。这个看法体现了梁启超的睿见。但是，他认为南轩与朱子没有什么区别，只见其同而不见其异，这又是他对南轩和湖湘学派的误解。以“湖湘学派”指称以张南轩为代表的南宋湖南地域理学，本是梁启超沿用朱子、《宋元学案》的传统称谓。同样是“湖南人”，同样是“湖湘学派”，梁启超对王船山的评价显然要高得多。他认为王船山是“非朱非王”，独成一派，其影响亦向下扩展至诸多湖南人。

<sup>①</sup> 湖南省文献委员会编，《湖南文献汇编》第 2 辑，1949 年版，第 405 页。

<sup>②</sup> 陆宝千，《刘蓉年谱·自序》，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 年版，第 1 页。

<sup>③</sup> 杨毓麟著，饶怀民编，《杨毓麟集》，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岳麓书社 2001 年版，第 32—33 页。

<sup>④</sup> 梁启超，《儒家哲学》，第 90 页。

“非朱非王，独立自成一派，当推王夫之（船山）。船山是湖南人，他这一派，叫做湖湘学派。在北宋时为周濂溪，在南宋时为张南轩，中间很消沉，至船山而复盛。……船山在清初湮没不彰，咸同以后，因为刊行遗书，其学渐广。近世的曾文正、胡文忠都受他的熏陶，最近的谭嗣同、黄兴，亦受他的影响。清末民初之际，智识阶级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并且有许多青年，作很热烈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久而愈昌了。”<sup>①</sup>梁启超认为，湖湘学派可追溯到北宋的周敦颐，其后有他评价不高的张南轩，而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独立自成一派的王夫之学说。他对“湖湘学派”的梳理，其实正是湘学的主要脉络。

### 三

此后，陆续有学者用到“湘学”概念，并对“湘学”作为“学”之统绪进行了学理上的追本溯源。

叶昌炽（1849－1917）在《缘督庐日记钞》中记载了叶德辉给他写的一封信中的内容：“焕彬自长沙来信，极论湘学渊源，上自船山，下逮曾文正、郭筠仙，今之湘绮、葵园……洋洋十余纸。”<sup>②</sup>焕彬即叶德辉（1863－1927）。以上叶昌炽转述叶德辉关于湘学渊源的论述，认为湘学往上可以追溯到王船山，向下可以延伸至当时湖南著名学者王闿运、王先谦。

不过，这样的转述与叶德辉本人的论述似有出入，或许叶德辉有多处不同的议论。《郁园书札·答人书》中说：“湘学肇于鬻熊，成于三闾。宋则濂溪为道学之宗，明则船山抱高蹈之节。迨乎乾嘉以后，吴越经学之盛，几于南北同宗。湘人乃独守其乡风，怀抱其忠义。经世之作，开风气之先。讲学之儒，奏戡乱之绩。流风广衍，本不以考据为能。近日无知之徒，乃欲依附康门，表彰异学。似此无父无君之学，天下皆得而攻之，又奚怪鄙人之摇唇鼓舌乎！”<sup>③</sup>这里叶德辉将湘学的源头自船山再往上推，不止讲到周敦颐，还讲到屈原，甚至上提到了周文王时的鬻熊。当然，正如陈代湘教授分析的那样，“他重点还是表彰宋明时期的周敦颐和王夫之”。<sup>④</sup>同样把湘学源头向上推至极远的还有戴德诚。他说：“三闾以孤愤沉湘，元公以伊尹为志，遂开湘学仁侠之大宗。”<sup>⑤</sup>在戴德诚看来，开湘学仁侠之大宗的是屈原、周敦颐，甚至也可以包括周敦颐推崇的伊尹。

在作于1943年冬的《近百年湖南学风》一书中，钱基博亦提到“湘学”概念。他通过仔细对比湖南二王（王闿运、王先谦）学问的异同，界定什么样的“学”才能称为湘学。他说：“王益吾先生以博学通人督江苏学政，提倡古学，整饬士习，有贤声。……然文章方、姚，经学惠、戴，头没头出于当日风气，不过导扬皖吴之学，而非湘之所以为学也。……王闿运之人之学，老辈颇多绳弹，然有其独到以成湘学。益吾先生，博涉多通，不啻过之，而无独到。”<sup>⑥</sup>二王都是湖南人，都是大学者。依钱基博之见，王先谦自是博

<sup>①</sup> 梁启超，《儒家哲学》，第112－113页。

<sup>②</sup>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船山全书》第十六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695页。

<sup>③</sup> 叶德辉，《郁园全书·郁园书札·答人书》，《船山全书》第十六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776页。

<sup>④</sup> 陈代湘，《湘学的内涵和范围》，《湘潭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第137页。

<sup>⑤</sup> 《湘学类纂·湖南宜善守旧》。

<sup>⑥</sup> 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页。

学多才，但其学基本上属于“皖吴之学”，虽是湘中之人，却无湘中之学的特色。而王闿运则不同，他不依傍门户，其学颇有独到之处。钱基博还以高攀龙作比，“如高攀龙之理学，绳以朱子之道问学，故为外道，而揆之阳明之致良知，亦未遽为入格也。然不入格而可以开宗。”<sup>①</sup>王闿运文章、训诂都不如王先谦“内行人格”，但恰恰是这一点使得他能够保有自己的独特性，自成一家。如说：“王闿运文章不为桐城，今文经亦非当行，然能开风气以自名家。益吾先生，文章桐城，训诂休宁，无不内行人格，然不能名家。”<sup>②</sup>

在钱基博看来，二王虽都是湖南人，但可以说王闿运之学是“湘学”，而王先谦之学却“非湘之所以为学也”。钱基博强调“湘学”之所以为“湘学”，最重要的是要有区别于其他地域之学的独特性。这种独立自成一派的特点，与前文梁启超评价王夫之“非朱非王”，而其学自成一派的标准颇为相似。

第一本以“湘学”为书名的著作是李肖聃的《湘学略》，此书作于1946年。在这之前的1924年，李曾应新化李景侨之邀，为庆贺《长沙大公报》创办十周年，而写了数万字的《湘学小史》。但此文似已遗失，至今未找到其原稿和相关资料。《湘学略》分二十六个学略简述湘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和思想，以《濂溪学略》为第一，胡安国、胡宏及门人弟子的《衡麓学略》紧随其后，之后有张栻、船山等湖湘学派的重要人物，亦有晚清邓显鹤、魏源、曾国藩、王闿运等近代湖湘人物。李肖聃对湘学史的梳理十分注重“学术思想”这一层面。除了将湘学学理的源头推至周敦颐，第二个学略即讲胡安国。胡安国、胡宏父子是真正意义上的湖湘学派的开创者，包括胡安国门下的长沙人黎明等，李肖聃都论述得很深入细致，如说：“湖湘学派之盛，才翁最有功焉”<sup>③</sup>，对黎明之于湖湘学派的贡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李肖聃对胡安国及其弟子的关注，是梁启超等学者没有讲到的。同时，他还注意到朱子学、阳明学对湖湘学派的影响。

此外，李肖聃在《湘学新志序论》中还从守节、致用、远利、避名四个方面探讨了湘学的精神。比如他论“守节”说：“吾考论湘学，次其长短，今为分言，以告同志。一曰守节：理学之说，深入人心。学者以圣道由我而传，圣人可学而至，则志气刚而节慨以立。濂溪（周敦颐，道州）和易，而伊川（程颐）谨严，性行不同，志道则一。船山先生（王夫之字而农，衡阳）孤忠亮节，屏绝声华，痛恶标榜之习，自晦等于幼安（管宁），苦心同于所南（郑思肖）。”<sup>④</sup>在李肖聃看来，湖南人守节的精神品质是来源于宋明理学的深刻影响。

## 四

李肖聃的《湘学略》出版于1946年，此后50年间，湘学基本上无人问津，只有个别学者偶尔提到“湘学”一词。湘学重新获得学界关注得益于方克立先生的大力提倡。1998年9月，方先生在参加湘潭大学四十周年校庆活动时，建议将湘学研究作为湘大中

<sup>①</sup> 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第113页。

<sup>②</sup> 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第113页。

<sup>③</sup> 李肖聃，《李肖聃集》，俞岳衡校点，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岳麓书社，第13页。

<sup>④</sup> 李肖聃，《李肖聃集》，俞岳衡校点，第307—308页。